

# 论苏轼贬谪期间的审美心境

## ——以《东坡志林》为考察对象

刘师健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苏轼既创造了惊人的艺术成就,又彰显了独特的人格魅力,在贬谪期间有着鲜明的以自然为美的审美心境。即:不再囿于自然山水的阻隔和贫乏的物质生活,而是以情为本,以超然的心态赏玩着生活中的普通之物,咀嚼着周遭的普通之事;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他笔下皆化为艺术,焕发生机,昭示着他澄明、宁静、平和淡泊、旷远而深湛的审美心态。这种无往而不适的审美人生智慧汇聚着孔子舞雩风流的人的自然化精神与庄子“适意不异逍遥游”的艺术境界,又有别于同时代以理为本,高谈道德伦理的理学,直指人的现实的情感愉悦,成为了古代士人安身立命的典范。

**关键词:**苏轼;《东坡志林》;贬谪;审美心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3-0084-06

苏轼在“人为侍从,出为方面”的人生观指引下(《答陈传道》),尽管官场屡不得意,却并没有因此隐居避世,而是充分“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sup>[1]</sup>,有着鲜明的变困顿为审美的心理。以往对苏轼审美心境的研究,或是理论性地阐释他的旷达人生境界,或仅从他抒情性的诗词、散文作品中透视他的情感,尚未见具体地从其叙事性笔记作品中予以探析。实际上,作者于其贬谪期间所作的叙事体笔记作品《东坡志林》,或记人,或记事,或记游,或品评人物,不管是优游山林,还是抒怀述友,作者都不再是埋怨、惶惑,而是如实记录,真实感怀,笔下的山山水水、凡事俗物都散发着灵性的光辉,浸透着作者的人生情感历练,展现着他超然物外与随缘自适的审美人生态度。我们正可透过他文中审美对象的这一特点反观作者的审美心境。

### 一、“闲赏”对象生活化

首先,作者闲赏景物时,并非是全然的游山玩水,而是在赏景之中,融入了更多的人文世俗活动。他不再是如魏晋士人那样普遍视自然山水为生活背景的点缀之物,只是静静地玄观山水,而是在游赏中亲近山水,与自然融为一体。他笔下的山水不再是高蹈远引、离世绝俗的场所,而是可游可居能够生活化的地方。如《逸人游浙东》<sup>[2]1-2</sup>,作者到杭州游玩龙井,风景中有孤山、石室、泉水、寿星竹,作者在这

收稿日期:2016-03-04

作者简介:刘师健(1980-),女,湖南长沙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散文与审美文化。

里品尝龙井,拜会僧侣朋友,人物活动与周围景物融为一体,泉水因此也散发着灵性,甘美异常,寿星竹也极伟岸。周围之物着上作者的心境而焕发着灵性。再如《游白水书付过》:

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缝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崖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暮归倒行,观山烧火,甚俛仰,度数谷,至江山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复与过饮酒,食馀甘煮菜。<sup>[213]</sup>

在白水佛迹院,作者尽情欣赏壮丽宏伟的瀑布,与幼子过在其间泡温泉,看瀑布,寻找佛迹,到家已“二鼓”。在自然风景中游玩嬉戏,于作者而言,往往乐享其中流连忘返。山水林泉是他赏玩的对象,亦是他的乐趣所在,有时还到了魂牵梦萦的地步。《记梦》篇:“予在黄州,梦至西湖上,梦中亦知其为梦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东一殿题其额云‘弥勒下生’。梦中云:‘是仆昔年所书。’众僧往来行道,大半相识,辨才、海月皆在,相见惊异。仆散衫策杖,谢诸人曰:‘梦中来游,不及冠带。’”<sup>[218]</sup>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系焉。

其次,作者在继承传统对景闲赏之外,又将物纳入视野,而且不再局限于精致的古玩、艺术品,而是将其扩展到普通生活中的平凡之物,它们是随处、随触、随见的周遭生活,且无崇高玄深之义,可于闲暇时随兴随赏。如《赤壁洞穴》:

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在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sup>[275-76]</sup>

作者赏玩的对象就是岸边细石,他会心琢磨其形状、色泽、纹理,就是这普通之石,也令他饶有兴味地欣赏着,展现的是赏玩细石过程中的乐趣和闲逸之情。这种赏物对象的生活化,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儋耳夜书》中,他这样描写: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

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斲矣。<sup>[25]</sup>

儋耳夜景的构成不是传统的星月河山、花草树木,而是“民夷杂揉、屠酤纷然”的社会风俗,是自然景物与世俗生活融合在一起的自然,是社会化了的自然之“物”。

闲赏对象除了伴有人文活动的山水林泉,赋予兴致的普通之物,还特别指向了平常生活之事。如《记承天夜游》<sup>[22]</sup>,文中作者仅记载了生活中赏月的小事,而且叙述极为简单。他本想“解衣欲睡”,但看到“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走到庭中,看到了如水的月光。月光汨汨地流进他的体内,涤荡了他的烦恼、忧愁。作者于月下物影杂沓之中,筛选出“月色”“庭院”“竹柏影”等柔和静谧的物象,融入主观的闲适之情,加以想象点染,造出空灵闲逸的意境。这种澄澈透明的意境展示,与胸无点尘的“闲人”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它既是一种物境,更是一种心境。《论修养贴寄子由》亦是如此,先写信寄子由,讨论关于修养的问题,又批评“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还将墙外传来的“悍妇与夫相殴骂”的实况摄入笔底:

……书至此,墙外有悍妇与夫相殴骂,声飞灰火,如猪嘶狗噪,因念他一点圆明,正在猪嘶狗噪里面,譬如江河鉴物之信,长在飞沙走石之中。寻常静中推求,常患不见,今日闹里,忽捉得些子。<sup>[29]</sup>

短短篇幅中,人生修养之事,昧者之感、夫妻吵架小事都在作者笔下颇有情趣地呈现着,蕴含闹中求静的哲理。

综上,作者闲赏对象已由传统单纯对自然景物的闲赏扩展到“普通之物”“生活之事”,并在赏玩中,渗透着作者的情思与理智,“闲”中有“赏”,“赏”因“闲”生,闲赏中营造出生活艺术化的独特语境,其对象因此而着上了文化的意蕴。

## 二、生活审美对象的文化表征

其一,寄托性情。在这些闲赏对象中,看似是作者随意为之,实则渗透着作者的情性。他在《游金山寺》诗中如此记载着山水清音: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波涛。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sup>[3]</sup>

金山寺山水形胜,江边落日奇观,诗作从寄宿漫游写到金山登顶,从断霞半空写到二更月落,从江火通亮写到怅然归卧,从江神见怪写到指水为誓,或实,或虚,或看,或想,从无生有,如图如画,令作者不由得浮想联翩,而生买田归隐之心。作者一生履迹甚多,饱览风景,自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或“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sup>[4]</sup><sup>432</sup>,或“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sup>[5]</sup>,一心向往在山水间寄托余生。

《东坡志林》中览山观水,抒写情怀的畅快文字,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表征。《陈氏草堂》描写“出两山间,落于堂后”的瀑布:“如悬布崩雪,如风中絮,如群鹤舞。”<sup>[2]</sup><sup>79</sup>这里,除了生动展现出一种雄伟活泼、纯洁缥缈的大自然景观,更写出了作者的想象、神情和观看瀑布由远及近的过程和心境:先远观,觉瀑布如凝止不动、高高悬起的白练,及至近前,则雪溅雷怒,如崩雪,仰视飞瀑,觉瀑布似动又似不动,似流又似不流,似花又似非花。凝视久之,飞絮幻化成了雪白的群鹤,仿佛在雷的节拍里鼓翼高蹈,在神奇的旋律中翩翩起舞。文字中,渗透的是作者对景观的赞美、倾慕之情。畅游其中,作者往往还忆事怀人,充分展现他对友人的怀念之情。如《记游松江》,书写昔日与友人在“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的欢愉宴饮的交流情景,而时至今日,“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sup>[2]</sup><sup>3</sup>,同是月明风清的夜晚,同是坐于江边亭阁之上,然此地非彼地,友人离他远去,蓦然回想,乃一梦耳,深深地体现着对友人人格的赞叹和对俊杰人物逝去的惋惜之感。《临臬闲题》中作者又以“闲人”自居:“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sup>[2]</sup><sup>79</sup>以闲者的心态尽情享受风月美景。只有“闲人”才是这无主江山的真正主人,也只有“闲人”才能领略到如此佳景胜概之中的无限乐趣,心闲而驰骋意绪,文末“所以不如君子,上无两税及助役钱尔”,化用李白“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的诗句,隐含对新法的讽刺。不过在闲适中,又一笑而已。

作者回归自然之中,既寄情山水,而又不囿于其中,他自言:“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赤壁赋》)谨以“寓”之,适时“舍”之,极具一种物我两忘,人与自然同在,精神与宇宙共存的哲理之思。盖宗白华先生说苏轼的创作“不是停留在工艺美术的境界,而要上升到表现思想情感的境界”<sup>[6]</sup>。山水中寄托着作者的情感,它不再是独立的自然之景,而是焕发着灵性、情感的文化符号。

其二,探索求知。闲暇的赏玩不是耽溺于玩,不是纵情任性,它有着更深层的用意。闲赏之乐,很大

部分是满足作者好学求知、广博见闻的心理需求。《记游庐山》深切地体现了他这种心理。“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为了专心饱览这“胜绝”之景，享受“胜绝”之境，作者一开始便“发意不欲作诗”<sup>[24]</sup>，完全以闲适之心沉醉山林。可不知不觉中，登山则情满于山，庐山盛景实是难以抵挡，诗作汨汨而出，一气而成七首庐山记游诗，诗作中或是对山中僧俗不忘故旧的感念，或是抒发游庐山夙愿得以实现的兴奋，或是对李白、徐凝歌咏庐山瀑布诗的评价，最后还道出了只有入内出外才能了解一个复杂事物全貌的哲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抒写畅游庐山的主观感受中，又传达着对事理的执著探索。

同样的还有《记游松风亭》，开篇记叙散步经历，“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由望亭之高远，而产生能否到达的疑问，后悟出令自己精神解脱的人生哲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sup>[24-5]</sup>由记叙而议论，从游历之中即兴产生顿悟，“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评朱子论东坡文》）<sup>[7]</sup>。作者在贬谪生活中，自然美景以及与朋侣交游而助发诗兴，这些日常生活的普通之景、之物、之事通过诗文而着上了文人化、艺术化的色彩，艺术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生活中无处不诗意。透过作者生活中闲赏对象的文化表征，我们进一步窥视其中所蕴含的深层审美心态。

### 三、贬谪生活中的多维审美心态

其一，闲须适性。苏轼旷达的人生与他不受外物所羁绊的人生观息息相关。他生性乐观旷达，随意而适性。闲适的赏玩中，展现了他无拘无束的本性。他曾在《苏氏易传》中说：

君子欲行道、德而不知所以然之说，则役于其名而为之尔。夫苟役于其名而不安其实，则大小相害，前后相陵，而道德不和顺矣……是以君子贵“性”与“命”也。<sup>[8]333</sup>

在作者看来，人之情感不应受任何外在权威、规范、法则等的束缚与管制。与其受道德善恶之虚名所奴役，不如顺应性情之自然。道德之实应是性与命，是人情，是人性本身，人的一切行为都应是源发自所以然之性情。这种自然的本性欲求比道德更为真实，更应该被人所重视。他的这种个体独立性、自主性实质指向着人的自用、自尊、自得、自成、自达、自乐，以身心的安逸和愉悦为归宿。而奔波于仕途，生命难免遭受异化之苦，无快乐可言。回归普通生活，返回人的本真的性情，是消解政治异化的有效途径。这种途径，便是在闲暇时，获取形体和精神的自由、活泼与愉悦。作者因而进一步认为“乐”直接表现为人的实践活动：

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知之者为主，是故虽无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中庸论》）<sup>[9]</sup>

于作者而言，“乐”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而非一般的心理情感表现，它是“以身心与宇宙自然合一为依归的最大快乐的人生极致”<sup>[10]</sup>，具有比一般心理原则意义上的“乐”更为深厚的力量，这才为“真乐”。如果单从情感心理原则上言，有喜必有怒，有乐必有哀，有乐也必有苦，这是人的情感之自然，也是人类生活之现实。人之难能可贵不仅在于可以居安处乐，更要能面对困境仍能“乐处”。苏轼不“沮丧、悲观、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sup>[11]</sup>。在他看来“乐事”“苦事”皆是外在的，是虚幻不实的：“寻声捕影，系风趁梦。”乐事并不可慕，而只是“寓意”焉；苦事也不可畏，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艰苦，却常言：“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答陈师仲主簿书》）<sup>[4]1428</sup>社会生活中凡乎琐事，世俗之物为其所赏，便是他这种心理的最好体证。他退避社会<sup>①</sup>，却在生活休闲中，自由自在，任情适性，身心俱泰，与道合一，追求的是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闲中有乐，乐而适性。

<sup>①</sup>李泽厚认为：“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64~165页。

其二,闲中有趣。在生活中,作者的闲赏并非一般的喜好、玩弄,它体现着作者从容不迫、淡定自若而又追求一种高雅理趣的审美心态,展现一种随兴而发、兴趣盎然、摒弃事务、平静淡泊而又精神高度集中的心境。他实实在在、兴致勃勃地寻觅现实生活中的雅趣,又仔仔细细、孜孜以求地追求精神生活中的雅境。正如他在《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中所言:

物有畛而理无方,穷天下之辩,不足以尽一物之理。达者寓物以发其辩,则一物之变,可以尽南山之竹。学者观物之极,而游于物之表,则何求而不得。故轮扁行年七十而老于斫轮,庖丁自技而进乎道,由此其选也。黄君道辅,讳儒,建安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详哉?昔张机有精理而韵不能高,故卒为名医,今道辅无所发其辩,而寓之于茶,为世外淡泊之好,此以高韵辅精理者。<sup>[4]2067</sup>

在作者看来,极为简单、微不足道的生活方式恰恰蕴含了巨大的价值,语境中的“物”便饶有情理,凡人用以“自修”的方式同样也可作为佛家子弟的“了悟”之径。他以休闲为人生之本,无处不在利用当地的环境与自己的遭际来获取闲适之乐。在闲赏的过程中深入世俗生活,而又化俗为雅,崇尚主体的闲情逸致,渗透深刻的人生之思、性理之趣。寓意于物,通过对物的观照,而获得一种审美自由的快感。“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丝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诗书可乐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将谢世路而适吾所自适乎?”(《送张道士序》)<sup>[4]328</sup>衣食住行极为简单,所娱乐者亦简单,交游也简单。“谢世路”的目的只为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简单的生活里,愉悦性情,展现自由人格。自由之中,自有情韵,自有快乐。世俗生活中的美的意识充实着作者的生活体验,而精神生活中的美的意识又慰藉着作者的心灵。在这种诗意般的闲赏玩乐中,生活中处处情韵悠扬,高雅别致。

其三,超然物外。作者闲赏中,体现着他超脱世俗、遗世独立、通达物理人情,苦乐由之的处世精神,这在《超然台记》中有最鲜明的解释: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辩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悲哀乎!<sup>[4]351</sup>

于作者而言,一切事物都能给人以乐趣,但人必须摆脱物欲而以自由自在的审美心灵去感悟它。可以“寓意于物”,但不能“留意于物”。“物”本身如何不重要,关键是人对之抱以何种心态。诚如他在《苏氏易传》中所说:“所贵于圣人者,非贵其静而不交于物。贵其与物皆入于吉凶之域而不乱也。”<sup>[8]124</sup>作者享受着日常生活的闲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相信,“怡情”只能通过“寓物”来实现,而“寓物”势必与“物”相关。这些“物”又确实是能够释放或激发人的洞察力。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通向终极之“道”,一颗开悟了的心既不会执于“物”,也同样不会执于“无物”。这就是诗人贴近生活,拒绝倚仗那些抽象的、脱离世间常识或常态的“更高的真理”的原因<sup>[2]</sup>。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惯常以美求福辞祸,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因此这种人为的区别常常将自己陷入可悲、可痛境地。而作者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这种对物的独特心态:物,本非我之所有,便不要想着去占有,而应释之以审美的方式去欣赏它,观照它,也就是要“游”于物之外。视物如清风勃然行于天地而无所定,活泼奔驰四方而无所骛,以当遇之法遇所遇之物,遇过之后便不留驻。也即他在《宝绘堂记》中所提倡的心态:“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sup>[4]357</sup>与物相交,寄情于斯,同时却不抱占有或永远拥有的企图,超然物外,这便是苏轼期望的理想精神境界,也是他在闲暇赏玩时的审美心态。

要之,作者虽身处穷途,却以闲者的心态赏玩着普通之物,平常之事,以闲适自得于自然,却又饶有寄意,生活中的周遭事物在他笔下皆化为艺术,焕发生机,情趣盎然。闲赏中见证他的情感与理智,昭示着他澄明、宁静、平和淡泊、旷远而深湛的审美心态。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令我们在他贬谪期间的“小文小册”中见出了“坡公之可爱”<sup>[13]</sup>。这种可爱既有孔学乐处、舞雩风流的人的自然化精神,又有庄子“适意不异逍遥游”的审美境界,他既从根本上超越了陶渊明对自然山水的深深眷恋,又脱去了白居易世俗化、人世化的物质追寻,不再局限于自然山水的阻隔和优裕的物质生活的困惑,而以审美的心态积极追寻自由的人格和独特的艺术创造。同时,又有别于同时代以理为本,高谈道德伦理的理学,他以情为本,直指情感的愉悦性,在性命自得之际寻求名教之乐与士人个体生命的自适,以一种超然的心境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宇宙的创化。苏轼这种以生命实践践行的自适、自得、自乐的人生境界成为了古代士人安身立命的生活典范,也定会在日渐被物欲所异化的现代时局荡起回音。

### 参考文献:

- [1]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M].张振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5.
- [2]苏轼.东坡志林[M].王松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苏轼.苏轼诗集:卷七[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307-308.
- [4]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苏轼.苏辙集·栾城集:卷24[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407.
- [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7.
- [7]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531.
- [8]苏轼.苏氏易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3,124.
- [9]苏轼.苏东坡全集:下册[M].北京:中国书店,1986:760-761.
- [10]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M]//刘貽群.庞朴文集:第3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19.
- [11]王运涛.略论贬官士人的特殊心态及其文学表现[J].沈阳大学学报,2004(5):81-85.
- [12]Egan Ronald C.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6-85, 162-168.
- [13]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045.

## The Study on Aesthetic Mentality of Su Shi During the Relegation

—Dongpo Zhi Li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Liu Shiji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As a great cultural man, Su Shi not only created prodigious art achievements, and revealed the unique personality charm. During his relegation, he wa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natural landscape of the barrier and poor material life of confusion, but based on love, nothing without happiness, Everything in life become the art and showed vitality in his creation, They witnessed to his emotion and reason, revealed his clear, quiet, peaceful, profound and thorough aesthetic mentality. This adaptive and aesthetic life wisdom converged natural human spirit of Confucius and “easy not different unfettered” art realm of Chuang tzu, and was different from the contemporary Daniel ethics of science, It pointed to the reality of people’s emotional pleasure, become the ancient intellectuals living example.

**Key words:** Su Shi; Dongpo Zhi Lin; relegation; aesthetic mentality

(责任编辑 王作)